

发展
译丛

鲁志强 主编

让开放发挥作用

新的全球经济与 发展中国家

丹尼·罗德瑞克 著

美

DEVE
LOPMENT

中国发展出版社
Overseas Development Council



国防大学 2 071 2433 3

让开放发挥作用

新的全球经济与 发展中国家

〔美〕丹尼·罗德瑞克 著

熊贤良 张 琦 彭 龙 何 善 译



中国发展出版社

Overseas Development Council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让开放发挥作用：新的全球经济与发展中国家/（美）罗德瑞克（Rodrik, Dani.）著；熊贤良等译.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10

（发展译丛/鲁志强主编）

书名原文：The New Global Economy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Making Openness Work

ISBN 7-80087-386-2

I. 让… II. ①罗…②熊… III. 经济发展-关系-经济体制-研究-发展中国家 IV. F1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4598 号

图字：01-1999-2670

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赵登禹路金果胡同 8 号）

邮政编码：100035 电话：66180781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1/32 850 × 1168mm 印张：8.125

字数：18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14.80 元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差错，可向发行部调换

总序

鲁志强

“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在一个人口超过非洲和拉丁美洲人口总和的国家,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瞩目的发展”。这是世界银行在其《202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研究报告中对中国的一段评价。其实,这个“最令人瞩目的发展”一直是几代中国人执着追求的世纪之梦。为了这个梦想,中国人为之百年奋斗,付出了无数的激情和牺牲;为了这个梦想,中国人为之百年求索,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和失望;为了这个梦想,中国人为之百年学习,视野遍及西方、东方、北方。直到中国共产党人才把这一梦想变成了理想,直到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寻求到了一条强国富民的正确道路,中国才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开始把这一理想一步步变为现实。我们正在完成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转型,正在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宏愿。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转型,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一个富于挑战的、艰巨的、充满风险的任务。何况我们是在一块承受着太多人

口的古老土地上,是在一个长期贫弱、饱受欺凌的国家里同时经历两个转型。“单是指令向市场的转型就是变幻莫测的:人们亲眼目睹了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崩溃。同样,从乡村型的农业社会向城市型的工业社会的转型也有许多风险。在富裕的工业国家中,这一转型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而在中国,这一进程被缩短到一代人或两代人的时间。”世界银行在同一报告中如是说:“(中国正在经历的)这两种转型的合力,产生了强大的旋涡和逆流,他们是可能破坏稳定的潜在因素,而且总是难以预测”。认为“中国在快速增长和结构变革中将会引发的一些新的难题:由于尚未完成的改革所造成的宏观经济不稳定阶段;就业和收入无保障状况的增加;尤其是在城市地区日益增大的环境压力;粮食自足成本的不断上升;不平等日益严重和根深蒂固的贫困;以及棘手、有时是敌对的国际环境。这些都是严峻的挑战,如果不加以解决,它们就会破坏增长的可持续性,而中国的前途也可能黯然”。这些预警式的判断,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思。

我们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人类即将进入 21 世纪。一方面,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正在步入信息化、全球化,改革的浪潮遍及世界所有国家。人类从来没有取得像今天这样的成就。世界经济迅速发展,有人已在议论世界性的“生产过剩”问题。但 1997~1998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再次暴露了今天的经济制度存在着巨大的缺陷,现有经济体系的合理性面临着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几个投机家就可能影响全球的经济景气,甚至触发世界经济衰退的现实,不能不让所有人认真反思和考虑,21 世纪应该怎么办。要解决这样的全球性体制问题,没有全球的共同努力是不可能的。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需要相互协调、相互合作。另一方面,人类在发展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同时也从来没有面临像今天这样多的问题:人口问题、生态环境

问题、资源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等日益困扰着人类。人们不能不对过去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提出疑问,并因而提出了争取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但要实现这一战略,真正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理想境界,没有几代人的努力恐怕是难以成就的。步入 21 世纪,有人形容人类的处境是:面临太多的问题,太少的答案。但历史已经证明,问题太多的时代就是人类即将进入有所突破的新时代。关键还在于人类自己。

要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有独立探索的精神,也需要有学习、吸收和借鉴全人类思想精华的胸襟和能力。我们希望能为此贡献菲薄之力。为此,中国发展出版社决定组织翻译出版“发展译丛”。

这套丛书的选编和翻译与一般的译著相比,有这样几个特点:

1. 这套丛书不是由名家或权威人士预先选定书目,再约请名家翻译定稿的,而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或其他机构的研究人员,在日常的研究实践中,从令他们眼睛为之发亮、深感开卷有益的新书中选定的。他们的眼光也许稍嫌稚嫩、短浅,但所选书目却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切身体会和感受。可以推测,对这样的研究人员认同的这样的著作,应该是值得关心中国经济问题的读者一读的。

2. 这套丛书的译者大都是推荐者本人,且大都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其他国内著名机构有为的年轻研究人员。他们的文笔也许还不够老到、优美,且难免有贻笑名家的败笔,但他们对于所选著作既有着良师益友般的知音之情,又有着对所译著作的拳拳慈母之心。他们愿意让所有和他们一样有使命感、责任感、参与感的读者一起分享他们的所得、所思、所求。这样的心情,应该会得到读者积极的反响和共鸣。

3. 这套丛书的选择和出版完全是开放的,它的书目、译者和出版都没有预先严加设定。我们愿作这样一种尝试:希望紧紧围绕中国现代化、市场化的进程,紧紧把握世界经济学的发展脉络,紧紧追随研究人员的思维和研究实践,不断增选新著作,不断组织新译者,不断扩充丛书内容,不断提高丛书质量。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呈现一种鲜活、求实的风格,一种淡泊、扎实的品位,一种负责、平实的境界。

我们的水平有限,眼界有限,能力有限,所为不一定能达到所思。但我们会以负责的态度,敬业的精神编译出版好每一本书。我们欢迎读者的批评指正,期待读者的推荐和建议,衷心用更高的水平回馈读者。

译者前言

丹尼·罗德瑞克，1957年出生于土耳其，198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同时在多个著名研究机构兼职，并担任多家经济学期刊的编辑。90年代中期以来，他在发展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领域十分活跃，提出的一系列“反潮流”的观点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所关注。

1997年3月，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出版了他的《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一书（中文版已作为笔者主编的《国际经济热点译丛》之一种，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该书从一个全新的——全球化对于发达国家的社会影响——角度，分析了全球化与社会稳定相冲突的三个来源，批评了主流经济学家低估全球化的风险的做法，并指出各国政府为了保证经济全球化的继续发展，应当在社会保障方面满

足人们不断上升的需要，在市场与社会间设计出一种平衡，这种平衡既保证私人企业家创造性的发挥，同时并不削弱合作的社会基础。这本书不仅出版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且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反响更大，显著提高了罗德瑞克教授在国际学术界的知名度。

1999年初，美国海外发展委员会又作为其“政策短论”之一，出版了罗德瑞克教授的新著——《新的全球经济与发展中国家：让开放发挥作用》。该书可称为1997年那本书的“姊妹篇”：一方面吸收了其中的一些观点，另一方面将视角集中于发展中国家，探讨如何正确认识开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过去20余年间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府如何才能让开放更有益于本国经济发展，而不是“为开放而开放”。作者在第6章中指出：

“事实上，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很弱，并且视与开放互补的政策和制度而定。

“开放的利益主要表现在进口方面：从更先进的国家进口新的思想观念、投资品和中间产品能够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但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做其他的事。他们需要创造有益于私人投资的环境……遵循我所说的投资战略。他们需要改善冲突管理制度……从法律上保障公民自由、政治自由、社会合作和社会保险，以便他们能够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并迅速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如果缺乏以上这些作为对外经济活动自由化的补充，开放不会有太多的收益。最坏的结果是，开放还会引起不稳定、扩大不平等和社会冲突。

“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是达到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标本身。以其他目标为代价，让经济政策瞄准经济中对外部门的业绩，相当于混淆了经济政策的目标和手段。并且，没有什么比强有力的

经济增长更有助于促进贸易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了。

“然而如果这些外部强加的约束不适合发生问题的经济或被认为是服务于某个特定社会群体的需要而损害其他人，也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恶果。保证不发生这种情况而必须满足的两个条件是：第一，作出服从外部约束的决策——通过在国际协定上签字、向国际竞争开放国内市场或接受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必须是民主的决策制定过程的结果，要有主要社会群体的参与。第二，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外部约束将有助于改善接受其约束的国家的经济业绩。显著地限制了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选择他们自己的路径的国际政策体制，可能在不具备这两个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不利于生产的增长。”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理论及战略问题的一个研究人员，笔者不想更多地在“译者前言”中就这本书的内容和观点“说三道四”——读者诸君自有明断，而想介绍自己近年来研究中国开放问题得出的某些结论。这样做颇有些“画蛇添足”的味道；但如果在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这对于读者们联系中国经济现实阅读罗德瑞克教授这本书、思考中国当前和今后“如何使开放发挥作用”的问题，能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冒这个险仍然是值得的。从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看，1999年以来的有关事件，似乎已经昭示着今后的中国将被“锁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或正在走着的那条路径上；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的是，果如是，不仅中国内部面临的诸多问题不会因为对外经济活动被纳入某一框架而自动解决，或者变得更易于解决——通常会受到更多的干扰，而且如何使开放本身发挥作用、如何减少开放带来的风险等问题，在中国将变得越来越尖锐，越来越迫切，也越来越复杂。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需要我们中

国人自己严肃、认真地思考，需要联系中国的实际，需要有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和学者们的研究——当然包括罗德瑞克教授的作品——中吸取营养的勇气和能力，而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时髦的理论”和“别人的答案”，用别人的思考代替我们自己的思考。

记得在 80 年代中期开始学习经济学的时候，找一本介绍“西方经济学”的中文书，已经不太难，而在北京图书馆或综合性大学的图书馆找一本英文的经济学教科书或《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经济文献杂志》这样的学术期刊，也一般能够如愿。很显然，这是国家实行开放政策带来的“福利”，使我们这一代所面对的“经济学知识的供给”多样化了。前几批想学习经济学的人可能都没有这样的待遇（今天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则更幸运了，能通过因特网了解到经济学的最新动态，下载更多的最新经济学文献，甚至与国外知名学者直接联系和交流，能充分享受到经济学知识全球化的“好处”）。80 年代末，在有关发展中国家开放战略问题的主流文献中看到的，以及从国外来中国“传道”的老师口中听到的，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经济学的先驱者们倡导的贸易保护政策、进口替代战略的批判，是对出口导向和外国投资的好处的无条件肯定，以及对国际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利益的描述。罗德瑞克教授所批评的开放问题上“新的正统”已经确立，再加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这样的国际机构对发展中国家开放政策的影响，出现了对开放所能达到的目标的过分信任，外向型成了准则，国际经济一体化本身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所认同的政策目标。宣扬类似观点的中文文献也随处可见。

虽然有看不完的外文教科书和参考文献、听不完的异域老师

的课，挥之不去的始终是眼前中国的现实。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有着太多不同于别人的特点，她的“最佳发展路径”一定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她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特殊阶段的开放战略一定也有着不同于别国的特点。这是笔者在读了一些书，听了一些课后的最初认识。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开始了自己在这一专业领域的研究。

在1991年的硕士论文中，结合西方有关文献，笔者研究了因为国内扭曲而导致开放经济福利下降的可能性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在消除国内扭曲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盲目追求经济的开放程度，追求对外贸易量的大小、吸收外资的多少和接受国外转移的数量。在1993年公开发表的几篇论文中，联系中国由封闭型计划经济向开放型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双重转轨”的特点，以及因为国内市场体制缺乏、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国内贸易转化为对外贸易等等而导致作为一个大国未能充分发挥国内市场巨大潜力的现实，笔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两类转轨的节奏应有所差别——加快在国内经济活动中贯彻市场经济原则，尽快建立起统一的全国性市场体系，逐步实现向开放型经济的过渡；“以开放促进改革并非最佳选择”，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国内区际分工和贸易的发展、国内统一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建立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改善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而这要求降低国内贸易的运输、通讯成本和政策性交易成本，割断各级政府与企业的特殊利益联系。

在1993年完成、1995年公开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即《对外贸易、国内市场与大国的经济发展》），结合中国尚未奠定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国内贸易潜力巨大又面临巨大国际竞争压力的现实，笔者得出的结论是：（1）中国为了自身的经济发展和对先行

国的追赶必须对国内市场实施有选择的适度保护。“中国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的获得不会凭空而来，从天而降，而是要依托巨大的国内市场”。“一旦失去了国内市场，很难设想它们（中国企业）还能找到比国内市场更为适当的学习场所”。（2）中国通过建立国内统一市场和发展国内区际贸易能够获得巨大的利益，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国内贸易能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并在中国总的贸易中占主导地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优势只有在其市场是一个统一体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中国国内贸易，特别是区际贸易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将在中国建设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就到来”。（3）对外贸易在大国的相对重要性降低，但“有控制的对外贸易仍能够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国内贸易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和润滑剂”。（4）“在有一批先行国存在的环境中追求发展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学习和模仿先行国的过程，除了制度、政策、科学等方面的学习外，直接作用于产品生产的主要是技术的学习”。“当中国人以自己的方式去认识、学习和模仿这种制度（即市场经济制度），把它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中的时候，这一制度将很自然地拥有中国特色”。“人口基数庞大，使中国在普及了教育之后，能够培养出绝对数量极大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经理人员。后进国教育的意义在于，它能够促进整个国家对先行国的学习，提高学习的效率，进而提高国际竞争力”。

在1995~1996年公开发表的几篇论文中，笔者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发展战略的选择要有大国意识”。“对有形产品的跨国流入进行有选择控制的战略，也不排除我们在信息的跨国流入方面采取极为开放的态度……信息的自由流入将有助于我们的学习活动。比起产品市场的开放，对外来信息采取开放的态度恐怕更为重要”。“由于国家越大，对纵向增长的依赖也越大，因此我们

不能要求落后大国像小国一样，仅仅依靠几种有限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就能实现持续的快速发展”。“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在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的关系方面，内部平衡是基础，一旦内部平衡被破坏，外部平衡的维持就会有困难。以牺牲内部平衡的方式维持外部平衡一般是不可取的。但无论是外部平衡还是内部平衡，都应服务于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这一目标”。针对我国面临的“改革”与“开放”的顺序问题，笔者重申了这样的观点：中国需要“加快改革的步伐，尽快在国内经济活动中贯彻市场经济的原则……而不是相反，加快开放的步伐，因为余下的改革较为困难而放慢改革的步伐”。

一见到这本书时，笔者“眼睛为之一亮”，以至决定将其翻译为中文的冲动，与在读到这本书以前得出的与之相同或相近的结论有关系。当然，这本书中也包含一些笔者想说而未能说出的话，以及许多未曾想到、受益良多的话。

这个译本的顺利出版，得益于许多人的帮助。首先要感谢《发展译丛》主编鲁志强研究员及中国发展出版社朱兵社长接受笔者对这本书的推荐。同时要向美国海外发展委员会的杰奎琳·E·布劳恩（Jacqueline Edlund Braun）表示感谢，她在联系罗德瑞克教授的书及列入附录中的几篇文章的版权时，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尤其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琦副研究员远在巴黎访问研究时加盟，北京外国语学院经贸学院彭龙院长和何蓉女士热情伸出援助之手，对按时完成翻译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笔者也要向他们致谢。本书的出版还得到了罗德瑞克教授的大力支持，他在百忙之中通过因特网寄来了言简意深的中文版序言。

在翻译过程中的具体分工是：原书第一、五章由何蓉翻译，第二、三、四章由张琦翻译，其余部分由笔者翻译，原书的校对

和统稿工作亦由笔者承担；中文版附件中的四篇文章由彭龙负责译校。由于时间较为仓促，加之我们中英文和专业水平的限制，不当之处一定未能尽免，还望读者们不吝指正。

熊贤良

2000年5月8日

经济发展要求贫穷的国家采用先进工业化国家流行的政策和制度吗？或者要求它们设计出自己的发展战略，当需要的时候把本国土生土长的制度（home-grown institutions）同进口的制度结合起来吗？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今天关于发展的争论正是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

那些把发展——不只是收入水平意义上的发展，也包括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上的发展——当做“趋同”过程的人认为，对政策制定者的核心挑战是尽可能快地采用西式做法（Western-style Practices）。由此引发的是迅速的自由化和快速地融入世界经济。另一方面，那些认为没有发展的唯一灵丹妙药的人，则强调制定政策方面的国家自主权，并且把实验和渐进主义作为所需要的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

当这两种意见以强烈的方式表述出来时,就各有其危险。“趋同”的观点忽视了历史经验。今天的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所做的,如限制贸易、广泛采用公有企业这种方式、为幼稚产业提供支持等,对其由穷变富作出过贡献,但都与目前在西方国家的传统观点相矛盾。那些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也显著地偏离了某些正统观点。另一方面,实验主义的观点倾向于低估成功国家的共同因素,如宏观经济稳定,尊重市场和私人的创意,对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友善的环境,牢固的公共制度。这种观点有时也忽视人权和政治民主的重要性,错误地把这些因素看做不适合于具有不同历史和文化传统社会的西式制度。

本书试图坚持以上两个极端之间合理的中间路线。本书批判了今天的大多数传统观点,强调了土生土长的投资战略、政治民主以及牢固的对自由化、放松管制和全球化引发冲突进行管理的制度的重要性。本书强调指出,虽然不是所有战略都能够发挥作用,但是可行的和成功的战略之间的差别通常比人们所想像的要大得多。经济发展最终源于土生土长的投资战略,而不是世界市场。发展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避免追求时尚,对全球化要进行深入的透视,并且集中精力于国内制度建设。他们应该对他们自己和国内制度建设抱有更大的信心,并且更少地依赖全球经济以及源于全球经济的想像中的美好蓝图。

正如我希望本书的内容将要说明的,这并不意味着将基本的经济学原则高高挂起,或者放弃经济分析。真实的含义是,我们应该更具创造性地应用经济学工具并为我们的想像留出更大的空间。

丹尼·罗德瑞克

2000年4月10日于麻省剑桥